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科研简报

2009 年第 4 期（总第 21 期）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编

2009 年 10 月 30 日

本期要目

学术研讨会

10 月 11 日，由国务学院国际政治系、美国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倪世雄教授新著出版暨中美建交 30 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文科大楼 725 会议室隆重举行。

学术讲座

1. 软文化与中国社会科学发展
2. 欧洲能否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
3. 香港在国家未来 30 年发展中的角色和定位
4. 综合水源治理

学术沙龙

10 月 13 日，国务学院青年教师沈逸博士在文科大楼 826 谈判与表决模拟实验室举办一场题为“信息安全与中美战略关系中的非传统因素”的学术沙龙。

● 学术研讨会

倪世雄教授新著出版暨中美建交 30 周年学术研讨会

10月11日，由复旦大学国务学院国际政治系、美国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倪世雄教授新著出版暨中美建交3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文科大楼725会议室隆重举行。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朱威烈、上海社科院副院长黄仁伟、上海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潘光等嘉宾、国务学院分党委书记沈兰芳研究员、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沈丁立教授、国际政治系主任樊勇明教授、国务学院副院长吴心伯教授、陈玉刚副教授、周帆副教授等出席了会议并作发言。

在代表发言阶段，各位专家学者围绕中美关系和倪世雄教授的新著《结交一言重 相期千里至——一个中国学者眼中的中美建交30年》展开了讨论：

朱威烈教授认为，倪世雄教授新著布局合理，娓娓道来，可读性强，为中国的优秀文化增添了新的光彩，体现了倪教授睿智、冷静的性格特点，也体现出其做人、做事和做学问谦逊、严谨的风格，折射出复旦大学“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思想精神；

黄仁伟教授指出，某种程度上，倪世雄教授新著是“上海学派”形成的一个缩影，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是国际关系理论和具体实践的结合的典范，也是上海流派的标志和学术研究成果的集萃；

潘光教授认为，这本新著是倪教授学术生涯的回忆录，是他学术活动的核心组成部分，倪世雄教授是中国最早引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人物之一。他认为，如果说中国政府可以设立民间特使，而倪世雄教授就是一名很好的民间特使；

沈丁立教授强调，倪世雄教授新著回顾了对中美关系的研究，是一本不同于传统规范的新书。倪老师具有的亲和力、凝聚力、感召力，以及他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阐发，无形中推进了中国民间外交的发展；

吴心伯教授认为，倪教授的成就不仅限于中美关系，还应包括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倪老师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引进功不可没，这一成果惠及几代学子，开风气之先，倪老师和他的学生一道，学以致用，将理论和实际国际问题相结合，从而使复旦大学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在自由讨论阶段，来自国际政治系和美国研究中心的蒋昌建、蔡翠红、陈玉

刚、张家栋、信强等先后发言。他们从回忆自己和倪教授生活、学术交往的点滴出发，结合倪老师在为人、为学两方面表现出来的高尚品质，评价了对倪老师新著的看法。

倪世雄教授谦逊地表示，2009年是他进入复旦的第50个年头，执教已经45年。这段时间，他只不过做了两件事：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和中美关系研究的发展做出了些微贡献，所以对于大家的评价，感觉受之有愧，他表示将把大家的鼓励和赞扬当作自己继续前行的动力；《结交一言重 相期千里至——一个中国学者眼中的中美建交30年》是他多年心血的结晶，为了这本书他花费了30年时间积累材料，整理资料占用了3年时间，著作61万字的初稿全系手写，写作耗费了2年时间。

最后，国务学院党委书记沈兰芳研究员对会议进行了总结，她首先对校内外嘉宾的到来表示真挚的感谢，对倪教授新著的出版表示热烈的祝贺。沈兰芳认为，倪世雄教授著述颇丰，桃李满天下，他通过自己长期不懈的辛勤耕耘，对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科的和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其所行所为令人感动、受人尊敬。

➤ 倪世雄教授新著简介

倪世雄教授的新著《结交一言重 相期千里至——一个中国学者眼中的中美建交30年》，从一个中国学者的视角，阐述、评析了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中美两国间从相互敌视到互相接触，最终实现关系正常化，并历经曲折发展至今的风雨历程。书中有针对性地整合、引用了大量已经公开发表的文献(其中有许多中美两国高层官员及知名学者关于中美关系的相关言论与观点阐释，这些言论与阐释，又有不少是通过作者与两国高层官员及知名学者的直接交流获得的，因而比较准确、完整)，结合作者本人近30年来直接亲历和间接经历的一些重要事件，比较全面地分析，评述了中美关系30年来的发展过程。

全书文字表述活泼、流畅，事件细节 穿插生动、感人，论点表述严谨而有说服力，是一本以通俗手法写就的有相当学术价值的学术读物。本书既可供一般社会读者阅读，也可为当代中美关系研究领域的专业人员阅读参考，更是有志于从事当代中美关系研究及相关工作人员的必读参考书。

● 学术讲座

软文化与中国社会发展

2009年10月12日，应国务学院团学联学术部和团委科创服务中心的邀请，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邓正来教授在3106教室作了一场以“软文化与中国社会发展”为题的学术讲座。

邓正来教授围绕“软实力”一词展开论述，主要探讨中国未来成长、成为真正大国所需要及时纠正的一些方面。邓正来认为，一个国家要提软实力、软文化就必须有一个前提：这个国家想要成为一个大国，成为一个有很高诉求的国家。中国在过去很长时间基本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却从来不讲软实力、软文化；甚至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也只提硬文化、硬实力。然而，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要求我们必须重视软文化、软实力。邓正来指出，目前我们软文化的确成为了一个反复提到的名词，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但我们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偏颇。

在中国成为大国的过程中，自身的软实力、软文化一定要被承认。一个大国，必定要与其他国家发生关系，势必涉及这个国家的软文化。中国发展的软文化应该是关于人类未来走向、关于世界未来发展、吸引其他国家关注，不应该闭门造车，而应该作为一个大国开始考虑人类、世界未来的理想图，所谓的 ideal picture。中国走了一条伟大的道路，一条前人没有开拓的道路，并不容易；但未来究竟走向哪里，有待历史、有人来评价，但现在我们需要思考，我们人类会走向何方。

邓正来提到，软文化总是不可避免的具有地方性。中国的发展，却对我们提出了要求，需要依靠社会科学的进步来满足，来解决存在的问题。

其一，中国需要在世界舞台上发言。这一要求源于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这一现实。1840年之前，中国虽然作为国家，在历史上独立存在，一直持续到现在；然而，一直没有加入世界的结构之中，对于西方为主体的这个世界并没有参与。1840年，国门被打开，中国出现在世界游戏的格局之中，但在这个舞台上却是可有可无。典型的表现便是，无论中国是否发言，都毫无意义。现在，尤其是加入WTO之后，中国好像已经加入到世界的游戏进程，开始在舞台上表演，但仍然被排开在核心外。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强大，已经成为世界的主角之一，但我们依然无法制订世界的游戏规则。这有许多原因导致，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

于中国并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中国还没办法来参与制订，因为中国本身的社会科学还十分薄弱。中国有自身的一套理论体系、思想概念，但无法推广到全世界，不具有广度。另一方面，中国的科学研究，不具有中国独特性。很多关于中国的研究，把“中国”换成“越南”、“柬埔寨”，结果可以成立。中国倘若无法解决这种独立性、特色性的问题就无法成立中国自己的影响。

其二，中国需要发展自己的社会科学。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反思了许多，但惟独少考虑了思想的根源。一百多年来，中国没有自己的哲学。只引入、争辩，不懂得发展自己的一套思想。邓正来指出，这一切的根源，就是学者把“中国”只看作是一种地理空间概念、人口范围概念，只是一个修饰，而非限定词。邓正来强调，我们要思考中国人的文化身份（culture identity）和政治认同（political identity）。中国需要解释，为什么中国取得了这三十年的巨大成功却没有一种理论来解释；中国更需要认识自己。

这是两个要求，同时也是两个使命。邓正来指出，在实现这两个使命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两个障碍：

第一个障碍是西方化。中国前几年有一种国际接轨热，一切都引用西方，去学习西方。许多时候，我们一味重视西方机制，以西方的理论解释中国的现象；以西方的方法解决中国的问题，使得中国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逐渐的迷失。例如，西方说中国没有民法，但事实上，我们只是没有“民法”二字，而不是没有民法的概念和实质。中国人应该到背后去看看，我们的文化身份是什么？我们的政治认同又是什么？中国人需自己研究中国人，从而更好的解释自己的发展以及世界未来的发展。邓正来提出：发言资格永远不等于影响力。中国不能抛弃长久以来的生存智慧来迎合西方。过于渴望世界活动中对方的认同，导致了中国在西化中曲解、凑合，引发了一堆问题，阻碍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丢失了中国自己。

第二个障碍是唯学科化。当我们要解决问题时，唯学科化的整体式，牵一发而动全身，导致问题纠缠在一起而无法解决，牵涉太多，缺乏了独立性；而当我们研究学问时，却给自己贴上标签，事先限定好自己是“某某学家”，肢解了学科的完整性，阻碍了科学的发展。

中国欲进一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重视我国的软实力。只有提高了中国的软实力，软文化，我们才能够在世界格局中有一个正确的定位，解决现

实的问题，走出目前的困境，成长为真正的大国。

最后，在座师生提出了关于哲学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中国软文化建设基础、中国政府与政府软文化关系、中国未来如何建设软文化的问题，邓正来从学者的责任意识、隐藏在背后的深层次关系、批判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思想自由、生存性智慧等角度回答了提问，指出知识分子的批判性使命并不在于停留在对具体问题的合理性论证，而在于揭示出被掩盖了的深层次的具备整体性和共时性关怀的问题。

（张云翔、凌云志 供稿）

欧洲能否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

10月23日，欧盟—中国学术网络主任、欧洲政策中心高级顾问、欧盟—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 Fraser Cameron 教授到我院作了一场题为“欧洲——下一个超级大国？”的讲座。本次讲座由国际政治系潘忠岐教授主持，陈志敏、陈玉刚、袁启龙和简军波等也出席并参与了现场讨论。

Cameron 围绕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介绍并展望了欧盟的外交与安全政策、一体化前景以及欧盟在全球各热点问题中的作用与影响。他首先从领土、人口、军事、经济及政治稳定等方面界定权力，认为目前欧盟综合运用各种工具应对全球性挑战，其权力绝非仅指军事力量。他指出，欧盟在军事方面拥有快速反应力量，积极参与在巴尔干、非洲、中东等地区的维和与危机管理活动；在经济方面，欧盟以其雄厚实力向世界各国、各地区提供发展援助、技术支持；在政治方面，欧盟关注民主与人权，推动对话协商、地区一体化及世界多极化。他认为，欧盟的逐步扩大不仅意味着其成员数量、领土、人口和经济实力不断提升，将欧盟的价值观和准则传播到欧洲大陆的各个地方，而且意味着欧盟在世界舞台上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Cameron 进一步就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FSP）展开讨论，深入分析了里斯本条约与 CFSP 的机制框架，指出欧盟旨在尽可能多的领域里采取共同的政策，而不是单一的政策。根据他的分析，恐怖主义、核扩散、失败国家及地区性冲突等构成了欧盟面对的主要威胁，而中、俄、印、日、加、美等国则是其重要的战略伙伴。关于欧盟与美国的关系究竟是朋友抑或对手的问题，他强调，欧盟与美国均为对方最为关键的双边关系，双方对威胁有着共同的界定，然而政

策取向不尽相同，具体而言美国倾向军事制裁的手段而欧盟欣赏胡萝卜与大棒的结合运用。

最后，Cameron 主任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展望欧盟的未来发展并预测了 2020 年的欧洲。他提到，届时欧盟将拥有包括土耳其、乌克兰等在内的 40 个成员国，欧盟将取代北约，国际格局中美国、中国与欧盟形成三足鼎立的 G3 局面，其中欧盟将拥有一位共同的外交部长，在联合国、世界银行等重要国际组织中占据一个共同的席位。

在场师生们还就里斯本条约框架下的常任主席职位、欧盟的人权关注与对藏独的态度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使大家对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进程及欧盟的对外与安全政策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与认识。

(潘忠歧 供稿)

香港在国家未来 30 年发展中的角色和定位

10 月 23 日，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顾问、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原总裁邵善波先生，作了一场题为“香港在国家第三个三十年发展中的角色与定位”的学术讲座，介绍了香港在建国初三十年（1949-1978）及改革开放三十年（1978-2007）这两个三十年中与大陆关系的发展和问题后，对香港在国家第三个三十年（2007-2037）发展中的角色定位和困难进行了展望。本次讲座由公共行政系周帆副教授主持。

第一个 30 年中，香港的发展得益于大陆解放后大量企业家、资金和设备的南移，在冷战中发挥了为大陆输送物资和联系海外市场的桥梁作用；第二个 30 年中，随着大陆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香港的桥梁角色逐渐淡化，更多体现在投资、技术管理、金融活动等方面协助大陆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在这个阶段的发展既得益于两制的构想，又受制于对“一国两制”的狭隘解读，导致香港与大陆的经济活动的广度和深度有待加强。

随着十七大新路线以及国家发展过程中面临一系列问题的提出，香港未来与大陆发展的重心是将服务业引入内地、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并在廉政反贪、土地管理、城市管理规划和社会管理方面协助大陆进行制度创新。灵活贯彻“一国两制”、理性对待文化差异、排除政治阻力、厘清政府市场关系是香港在未来三十年国家发展中角色与定位必须解决的问题。

(周帆 供稿)

综合水源治理

10月26日，联合国大学水资源、环境、健康国际网络负责人之一 Velmal Grover 博士在复旦大学 6405 教室作了一场题为“Integrated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国际政治系陈玉聘组织。

联合国大学水资源、环境、健康国际网络于1996年创建于加拿大安大略的汉密尔顿，主要进行水资源、环境和健康的研究，帮助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Velmal Grover 主要探讨全球性的水危机以及由此带来的健康问题，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提出，包括消灭极端贫穷和饥饿、普及小学教育、促进两性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力、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产妇保健、与艾滋病毒、疟疾以及其他疾病的对抗、确保环境的可持续能力、全球合作促进发展。

关于解决水危机投入的成本与收益分析，很少的投入可以带来巨大的效益，同时，有助于解决就业机会、人类健康和两性平等的问题，然而，目前各国在水资源上的投入远远不够。

Velmal Grover 指出，综合水源治理是“一个促进水、土地和相关资源对等发展和管理的过程，其目的是在不损害重要生态系统可持续性的情况下，使经济和社会效益合理的最大化”，并简单指出了实施水资源综合管理实践中遇到的挑战、综合部门方案制订办法（sectoral approach）成功治理水危机问题关键是需要一个有效的管理，这需要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完善的法律，良好的政治架构等。

（陈玉聘 供稿）

● 学术沙龙

信息安全与中美战略关系中的非传统因素

10月13日，国务学院青年教师沈逸博士做客文科楼826谈判与表决模拟实验室，以“信息安全与中美战略关系中的非传统因素”为题的学术沙龙。沈逸博士的研究方向为信息技术与国际安全，本次学术沙龙也是其过去一年在美国乔治城大学进行博士后访学的成果。

沈逸援引了“2009年伊朗骚乱与推特革命（Twitter Revolution）”案例，呈现了信息安全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同时，沈逸还列举了其他关注点较高的例子，比如在西藏“3·14事件”和新疆“7·5事件”中新媒体的角色，“中国黑客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不断被外国媒体炒作，又如美国提出“网络中心战”与“信息化战争”等，把主题引入了信息安全的领域内。

沈逸简要补充了信息安全这一课题的背景知识，介绍了信息技术在硬件设施与实际应用的双方面演进，从军事、经济、政治三方面论述了信息技术与国家安全的联系。在此基础上，可以阐发三个基本问题：信息管理的合法性、可能性、必要性，并具体解释了个中困惑与挑战，尤其是来自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挑战，例如战争的危险，使信息管理成为徘徊在主权与人权、国家安全与个人隐私之间的争议性问题。

沈逸运用一系列实例阐明了美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演进过程。二战后，尽管与宪法第一修正案和自由主义理念背道而驰，战争情报的需求终令美国政府获得了监视民众隐私的权力。波匈事件、水门事件以及三叶草事件是进入冷战时期美国政府的典型实践。水门事件的揭露曾令肆意的政府受到管制，然而，“9·11事件”后，布什总统解除了1978年对外情报法案中不得监听美国公民的禁令，虽然遭到了国内如公民自由联盟等民权人士的反反对，但是在反恐战争的名义下，信息管理的主动权又回到了政府手中。沈逸还提到了奥巴马总统上台后设立的新职位——网络沙皇（Cyber Czar），其目的在于协调网络安全事务，整合政府的信息资源，备战网络战争。

沈逸将美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分为防御、控制、塑造三个层次，对应的目标依次为：防止针对“至关重要基础信息设施”的攻击；对特定范围内特定类型的

信息活动实施有效的监控；确立符合特定标准的网络行为准则，包括对信息内容和流动方向的控制。为了进一步解释这三个层次，沈逸介绍了美国联邦调查局代号为“食肉动物”的电子邮件监测系统，但其由于涉及侵犯公民隐私权在美国国内引发广泛争议。

在沙龙的下半场，沈逸着重分析了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战略关系是基于对特定国家的整体“意象”所形成的理解该国行为意义、指导涉及该国政策制定基调的关系总和。美国眼中中国的意象，少不了意识形态的历史影响，也有客观战略利益矛盾的因素在起作用。战略意图与互信作为非传统因素，对于中美战略关系至关重要。

沈逸通过 2002 年布什总统在国家安全战略中提出“建立民主基础设施”、2009 年克林顿在纽约大学关于“新媒体与美国的公共外交”的讲话、2009 年伊朗“推特革命”三个例子，说明了美国政府正力图借助网络传播其民主价值观。同时，他也解释了美方对于网络攻击所代表的战略涵义的认知。现实的思考一直不曾间断，例如对于中国政府而言，美国是否始终没有放弃利用互联网进行颠覆和渗透的设想，而对于美国政府，中国是否正谋求对美国发动“电子珍珠港袭击”，引发了大家对互联网与政治意涵的思考。

沈逸对于中美战略关系中消极的一面作了深入的分析：其一，双方倾向于“做好最坏的打算”，其共同特征在于“过高估计”潜在对手的力量，有寻找压倒性优势与“终极武器”的惯性等；其二，跨国界的信息管理存在着高度复杂性。沈老师以绿坝风波点出了其中话语权争夺、危机决策等核心难题。

最后，沈逸总结指出，以上种种会对中美双方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恶化对彼此战略意图的认知，进一步增加不确定性，削弱了长期合作的战略基础。如若有一天，偶发的黑客袭击被误认为是网络时代珍珠港袭击的前兆，后果将不堪设想。

(沈逸 供稿)

编辑：张超施莹

审核：刘建军